

西藏研究丛书

毛泽东

降邊嘉措 著

與達賴班禪



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藏研究丛书

毛泽东与达赖 班禅

降边嘉措 著

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杨一舞
责任编辑：陈慧莉

毛泽东与达赖 班禅

作 者：降边嘉措

出版发行：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锦屏街锦屏楼14F/D座

印 刷：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

开 本：787 X 1092 16开

字 数：35万字

印 次：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62-448-035-1

定 价：港币88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1953年达赖喇嘛在西藏罗布林卡。



2、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3、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的当天，前往布达拉宫拜会达赖喇嘛，实现历史性的会见。



4、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新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欢度佳节，特于2月24日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宴会，这是他们在宴会前进行愉快的交谈。



5、1954年毛泽东和达赖喇嘛在一起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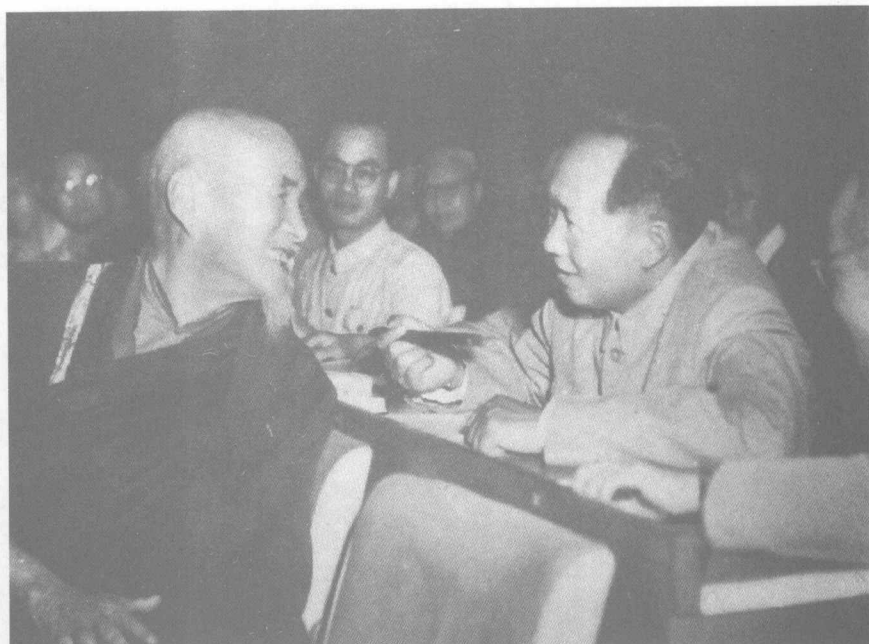


6、1954年，达赖喇嘛向毛泽东献哈达。



7、1951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十世班禅，陪同接见的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8、1954年9月，第一届
全国人代会期间，毛泽东
与喜饶嘉措大师在主席
台上亲切交谈。



9、50年代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在一起合影。



10、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从西安乘专车前往北京，这是在火车上看画报的情形。



11、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为副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等64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图为毛主席与部分委员合影。其中有两位少数民族成员，即：刘格平（回族）和赛福鼎（维吾尔族）。第三排左起第一人为刘格平、第二人为邓小平、第三人是陈毅、第四人是周恩来、第五人是赛福鼎、第七人是陈云。



12、1954年10月1日国庆，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达赖喇嘛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赛福鼎。



13、1954年10月1日国庆，群众进行队伍中的文艺大队，表演藏族舞蹈通过天安门。



14、1954年9月11日，毛主席亲切接见达赖与班禅。左起依次为：噶厦官员、刘格平、李维汉、邓小平、刘少奇、达赖喇嘛、毛主席、班禅、周恩来、张经武、计晋美、范明、王乐阶、汪锋、平措旺杰。



15、1954年4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专程到成都来为达赖喇嘛送行。左起：徐谌庐（西藏军区联络部部长）、刘格平、李大章（四川省省长）、达赖喇嘛、周总理、陈毅、平措旺杰（时任西藏军区民运部部长）。



16、1954年10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广济寺进行佛事活动，并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前排第三人为喜饶嘉措大师、第四人为达赖、第五人为班禅、第六人为达赖经师林仓活佛，第七人为班禅侍从高僧，第八人为赵朴初（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17、达赖的姐姐尧西·次仁卓玛（左第一人，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主任委员）与丁磊（中），刘格平夫人在一起。

代序 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的论述

题解：

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央统战部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举行，会场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毛泽东与西藏”。我提交的论文，题目刚好也是《毛泽东与西藏》。

后来，在我院前院长、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专著，约60万字，于十五大召开前夕，即1997年8月完稿送审。

但因主管部门审查通不过，11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召开了十六大和十七大，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也召开过了，至今依然不能正式出版。历时11年，历经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三任院长，主管部门的三位部长，一部书稿依然不能通过，又没有讲不同意出版的任何原因和任何理由。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几千个研究人员中绝无仅有；就从全国范围来讲，也不多见。这是在有关西藏问题书稿的审查方面，一个体制性的弊端。

尽管如此，一些同志依然十分关心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希望能早日问世，对全面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圆满解决西藏问题，有所贡献。有鉴于此，在万般无奈、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该书中毛主席关于达赖和班禅的论述选编出来，结合近年来我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为便于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我撰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将《毛泽东与西藏》的《前言》刊载于此，作为代序。

1956年2月24日晚，在前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和修改后写成的。1956年12月29日，根据新的形势，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¹后来被称作“两论”，是两篇重要的历史性文献。

1963年秋天，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并展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大论战。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中共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批判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这就是著名的所谓“九评”。1963年9月13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一开头便指出：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²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毛泽东，才在政治、军事、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独步千秋。他的思想、精神、风范和品格，影响了、塑造了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灵魂，从而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到、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让全世界不得不以惊讶和崇敬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东方伟大的民族。

20世纪中国的发展，与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紧密相联；20世纪世界的风云，与毛泽东的名字不可分割。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的伟大事业，必定会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

1 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参阅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31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

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4月出版。

新的千年。21 世纪中国的崛起，21 世纪中国的昌盛，必然以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为基础。

作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加上其他许多因素，毛泽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因此，对于毛泽东的议论，对他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将长期进行下去；学习、研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项责无旁贷的严肃的政治任务。

1959 年 3 月拉萨事件发生后，西藏问题成为国内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1959 年 5 月 6 日，以写作和发表“两论”相同的形式，《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提议和主持下写成的。原新华社社长、主要起草人之一吴冷西同志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作了详细介绍。¹

在这一篇文章里写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份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议论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²

这一论断不幸而言中，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国际上依然有很多国家、政党、团体和个人“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西藏问题依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依然是我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下去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西藏工作非常关心，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的论述，是毛泽东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我自己认为，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全面理解、正确阐述、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好我国民族工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在国际上，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个在统一的、多民

1 见《忆毛主席》，第 115—131 页。

2 转引自《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第 3 册，第 1 页，民族出版社 1959 年 5 月出版。

族的国度里，处理好民族关系、解决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成功范例，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当今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能够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中东地区、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我们的友好邻邦印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经常为民族和宗教问题所困扰。

同时，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精深博大的内容。如果忽略了毛泽东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就不能认为是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一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价。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从毛泽东与西藏这样一个视角，去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是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认识、对待、处理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毛泽东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群众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侧面。重点自然还是西藏问题。

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50年8月参军，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1954年到内地学习。1956年调到北京民族出版社，长期从事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参加过《共产党宣言》（藏文第一版）等马列著作的翻译，参加过《毛泽东选集》1至5卷初版和第二版（译文修订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著作的翻译出版，多次参加过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以及其他全国性重要会议的翻译，我还参加过上面提到的“九评”及党和国家重要政策文献的翻译出版，直到1980年，长达24年之久。我在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前辈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下成长。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向藏族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事业。我为此感到无尚荣光，无比自豪。

1981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藏族文学研究，重点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服务对象依然是藏族人民。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藏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和学术考察。作为《格萨尔》研究的学科牵头人，我可以实事求是、负责任地说：在我国众多的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中，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

一个藏学工作者，像我们《格萨尔》研究人员那样，深入到最边远、最偏僻、最贫穷的山寨、农村和牧区。因为那里是作为藏民族的主体——农牧民群众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格萨尔》流传最广泛、最能彰显这部古老而永葆青春的英雄史诗艺术魅力和生命活力的地方。与此同时，对于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学者来说，也是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学习群众、体察群众的心愿和情感，了解群众疾苦最好的机会和途径。

因此，我对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的论述，有一定的了解；对建国以来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历程，比较熟悉。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藏族地区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对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所遭受的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误，也都有切身感受。我曾与生我养我的藏族人民一起，同时也与全国各民族的同胞兄弟一起，沐浴阳光雨露，分享翻身解放的喜悦；对于因“左”的错误而使藏族劳动人民（主要是贫苦农奴和牧民）所遭受的不应有的苦难，感同身受，有着深刻理解。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准备和资料积累。

我的专业是研究藏族文学，重点是英雄史诗《格萨尔》；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研究“毛泽东与西藏”这样的重大课题，似乎与我的专业、与我的本职工作关系不大；与我的身份也不太相称。但是，毛泽东生前一再教育全党同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青年毛泽东十分赞赏顾炎武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自己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以身许国，以身报国，以天下为己任。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国有句古话：“位卑不敢忘忧国”。这也是一切正直而有良知、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情操，更何况我们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的知识分子。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有义务，本着对党的事业、对藏族人民和我国各族人民负责，同时也对历史负责的严肃而科学的态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为武器，以党中央主持召开的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有关问题进行回顾与反思，为今人，更为历史留下一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而不是杜撰或经过加工、经过篡改的文献资料，以便传信存真，告慰前辈，警策今人，昭示来者。

徐向前元帅在耄耋之年，不顾病魔缠身，精心撰写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徐帅在《序》里说：“鉴往而知今。人民群众不仅在创造着历史，同时也在认识着历史。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¹诚哉，斯言。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至今已四十多年，很多当事人已经故去，史学界存在一个“抢救活材料”的问题，很多人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在搜集、记录和编著“口述历史”。在西藏问题上，更是如此，更为紧迫。否则，人亡事灭，资料散佚，有些问题，以后更说不清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这对于继续贯彻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在党中央领导下，加强汉藏团结，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国防，建设繁荣、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1997年8月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